

# 消极伦理与色情叙事

——从小说伦理看《金瓶梅》及其评论

李建军

---

进入现代以来,从鲁迅开始,对《金瓶梅》多有夸赞逾常的“过度诠释”,而对它在小说伦理上表现出来的消极倾向,则缺乏必要的质疑和充分的批判。本文在梳理、评析现当代《金瓶梅》评论的基础上,从小说伦理的角度批评了这部“奇书”的消极伦理倾向与色情描写问题。

---

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金瓶梅》无疑是一部重要的小说。它上承《水浒传》,下启《红楼梦》,继往开来,完成了中国小说从志怪模式和英雄传奇向以日常生活为内容的世情叙事的转换;它的耐心、细致、灵活的描写技巧,它对生活场景精细入微的展示,对人物动作栩栩如生的刻画,尤其是对人物语言口吻毕肖的描写,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有学者说它“突破了古代小说的旧观念,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的成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从小说伦理角度看,《金瓶梅》又是一部存在严重问题的小说。原其本旨,也许的确意在教人束修守善,然而,从叙事效果来看,却是为好成歉——在《金瓶梅》的生动、真切的微观事象里面,阴暗的心理如沉重的阴霾,给人留下特别消极的阅读印象。虽然,它对社会黑暗和荒唐淫乱的观察,也是较有深度的,但是,根本上讲,它对人性缺乏充分的信任,对人的命运和境遇缺乏深刻的同情和温柔的怜悯,对外部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生活缺乏公正而全面的观察;它的女性观尤其成问题,仍旧没有脱出“女子难养”、“女人祸水”的偏见。很多时候,它显得趣味粗

---

美国的韩南教授在《金瓶梅探源》一文中,系统地研究了《金瓶梅》的“来源”以及《水浒传》、《港口渔翁》、《如意君传》和白话短篇小说、说唱文学、戏曲等多种文本和文学样式对《金瓶梅》的“影响”。他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作者仰仗过去文学经验的程度远胜于他个人的观察。引用的过去作品自然形成作者赖以写作小说的文学背景的组成部分之一。文学背景对它影响的深入尤其令人注目。”(徐朔方编选校阅《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周钧韬:《金瓶梅新探》,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张竹坡显然认同《金瓶梅》对女性的歧视态度:“《金瓶》虽有许多好人,却都是男人,并无一个好女人。屈指不二色的,要算月娘一个。然却不知妇道以礼持家,往往惹出事端。至于爱姐,晚节固可佳,乃又守得不正经的节,且早年亦难清白。他如葛翠屏,娘家领去,作者故未定其末路,安能必之也哉?”(《金瓶梅》,张竹坡评,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8页。)

鄙,格调不高,把性、仇恨、报复等原始性的本能行为,当作生活的核心内容甚至全部内容。从艺术上看,它的描写技巧和语言能力,虽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显示出作者过人的才华,但是,它缺乏伟大而成熟的小说伦理精神——它以客观的形式表达了极其主观、狭隘的人性观;它的反讽每每言过其实,夸张过度,反倒失去了更为巨大而普遍的影响力。

然而,对于《金瓶梅》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伦理境界上的问题,我们不仅缺乏充分的质疑和分析,而且巧言回护。最近若干年来,更是大有将《金瓶梅》奉为正则宝典之势,有些海外学者甚至不惜通过贬低《红楼梦》来抬高《金瓶梅》。当此时也,如何评价《金瓶梅》,就不仅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一部具体作品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与确立可靠的文学价值观和评价尺度相关的问题,一个与重建中国小说的精神传统相关的问题。

## 一、现代视阈下的过度阐释

性描写的泛滥和粗俗,是导致《金瓶梅》伦理境界低下的一个致命问题。任何对于《金瓶梅》的溢美性过度诠释,都必须首先在这一点上为它文过饰非。在明清两代,为《金瓶梅》的性描写进行辩解,有两种常见的策略:一种是像弄珠客那样把责任推给读者:“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一种是像张竹坡那样用“苦孝”说赋予它以伦理上的正当性:“《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咽,而作秽言以泄其愤。”

到了现代,在观念更新、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下,泛滥的性描写不仅很容易得到宽容的理解,而且还会被视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先锋行为。同时,强调真实性和反抗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引入,也使淋漓尽致地揭露黑暗成了评价小说的重要甚至首要尺度,而《金瓶梅》的暴露黑暗的社会批判性,显然满足了这一标准,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得到了极高的赞誉。尽管这种批判的力度,因为恣纵而粗俗的性描写而大大减弱,但《金瓶梅》还是因为其讽刺的尖锐,得到了现代学者和批评家的宽容和赞许。

鲁迅对《金瓶梅》的评价无疑是独具只眼的:“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现,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鲁迅肯定了《金瓶梅》对世态人情深邃练达的观察能力和灵活多变的描写技巧,赞赏它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特权阶层的无情反讽,尤其提醒人们要看到这部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他还以“衰世”的“万事不纲”说明了《金瓶梅》“爱发苦言,每极峻

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金瓶梅》,张竹坡评,第8页。

例如,1936年4月,阿丁就在《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一文中这样说:“书中虽全写色之害人,而对于反抗礼教之束缚,以情欲为个人生理所必需,则能极大胆极彻底的表现。”(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在《金瓶梅词话》的发端部分,便可以看到接近“阶级斗争”话语的社会政治批判言词:“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皆袁州劫县,放火杀人,僭称王号。惟有宋江,替天行道,专报不平,杀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在第三十回,作者再次尖锐地指斥现实:“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同前,第361页。)有必要指出的是,第一回中的批判性话语,在崇祯本《金瓶梅》中被删掉了。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鲁迅说它“骂尽诸色”,署名廿公的《金瓶梅跋》则说它“曲尽人间丑态”(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第216页。)看法大抵相同。

急”的原因,又以“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揭示了这部小说“时涉隐曲,猥黩者多”的必然性。总之,鲁迅着重从社会写实和小说艺术的角度,肯定《金瓶梅》的“诚极洞达”的观察力和“无以上之”的描写技巧。

鲁迅充分地揭示了《金瓶梅》的社会批判意义和艺术性,但是,却没有从伦理精神上对它“描摹下流言行”的一面进行必要的质疑和否定,没有从文学的理想维度和伦理境界方面指出它的严重残缺——这使得鲁迅对《金瓶梅》的评价,似乎不仅不够全面,而且颇有过誉之嫌。

鲁迅关于《金瓶梅》的过于“现实主义化”的评价,被后来的一些学者和批评家奉为圭臬,翕然附从。如此一来,从社会“批判”和描写“技巧”角度研究《金瓶梅》就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研究方法,而从道德诗意和伦理境界角度对它的质疑,却很少见到,《金瓶梅》因此便被抬到了至矣极矣、蔑以加矣的高度,甚至动辄被称为“一部伟大的小说”。

在鲁迅之后,郑振铎是对《金瓶梅》研究用力甚勤、贡献亦大的学者,也是对《金瓶梅》赞誉最高的人。在出版于 1927 年的《文学大纲》中,他对《金瓶梅》的评价还是克制和客观的:“此书在世为禁书,以其处处可遇见淫秽的描写。这也许是明人一时的风气。如删去了这些违禁的地方,却仍不失为一部好书;它的叙写,横恣深刻,《西游记》恐怕还比不上,不要说别的了。”但是后来,他对《金瓶梅》的评价,就高到了不适当的程度。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中极力肯定《金瓶梅》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乎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黑暗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很容易使一个学者对《金瓶梅》产生极大的共鸣和认同,并把这部叙写几百年前世态人情的作品,错当做对自己时代的控告书:“她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作品,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在这篇并不长的文章里,郑振铎至少五次用了“最伟大的”、“很伟大的”和“伟大的”来赞美《金瓶梅》和那位“天才”。而对它的“许多秽褻的描写”,他也是曲为回护,诿过于环境:“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的;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在这淫荡的‘世纪末’的社会里,《金瓶梅》的作者,如何会自拔呢?随心而出,随笔而写;他又怎会有什么道德利害的观念在着呢?大抵他自己也当是一位变态的性欲的患者罢,所以是那末着力的在写那些‘秽事’。”虽然,郑振铎的观点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是,从根本上说,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的。人固然也受环境影响,但是,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不是环境的被动的奴隶,而是因为他能对抗甚至改造环境。真正伟大的文学永远以一种对抗的精神姿态与环境发生关系,而不是被动地顺应环境并成为它的牺牲品。而且,一般来讲,置身于恶劣的环境并与之相周旋,几乎是文学的宿命一般的境遇。伟大的文学并不逃避这种境遇,也不随分从时地与它和平共处,而是挑战它,征服它,直到最后超越它。

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是一套颇获好评的教材,但是,它对《金瓶梅》的评价,却实在有些混乱而不得要领:“在《金瓶梅词话》中,看不到理想,看不到正义,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凶残的剥削者、压迫者终身受用不尽,善良的人一辈子在苦难中煎熬、悲惨地死亡。从

---

对《金瓶梅》的写作技巧,张竹坡也曾高度评价:“危机相倚,如层波叠起,不可穷止。何物作者,能使大千世界,生生死死之苦海水,尽掬入此一百胡珠之线内?嘻!技至此,无以复加矣。”(《金瓶梅》,张竹坡评,第 1382 页。)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第 16 页。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6 页,第 227 页,第 235—236 页。台湾学者魏子云甚至认为删之亦无必要:“有人说,纵然剔除了金瓶梅中的色情描写,也不致损害了金瓶梅这部小说的伟大。相对言之,若是包容了它其中的那么多色情描写呢?自不致损害了金瓶梅这部小说的伟大。”(魏子云:《小说金瓶梅》,台湾学生书局 1988 年版,第 59 页。)

这点来说,《金瓶梅词话》所显示的,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并未涂抹上理想色彩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真实。”“凶残的剥削者、压迫者”和“善良的人”这样的符号化标签是否有些过于简单?此处的评价还容易给人造成一个错觉,似乎“理想色彩”“涂抹”得越少,就越能获得“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真实”效果。其实,往深里追究,这部教材对《金瓶梅》的含混、矛盾的评价所反映出的,正是我们面对《金瓶梅》的一种复杂心态。这是由长期流行的恨世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带给文学批评的尴尬——按照这种理论,对龌龊、黑暗的社会现象进行淋漓尽致的揭示和描写,就足以使一部作品获得很高的评价,而一种更为开阔的伦理视野和更为严格的道德尺度,则会因为缺乏政治批判意识和美学感受能力而受到排斥。然而,《金瓶梅》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它的伦理境界太低下,道德诗意太贫乏,因此,对于它来讲,首先需要的就是基于道德标准和伦理尺度的严格批评。

作家刘心武承认“《金瓶梅》写性,下笔往往坦率直露,基本上都属于色情范畴”,甚至承认这种描写“对一般读者特别是未成年人起着不良的作用”,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把《金瓶梅》当做“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此书的真髓,我以为主要体现在笼罩全书的‘叙述调式’或‘文本特征’中,那便是客观、冷静、不动声色、处变不惊、怨而不怒、生死由之,它昭示着我们,世界不可能那么理想,生活不可能那么美满,人间本来就一定会有龌龊,人性本来就一定要有缺陷,善恶界限往往难划,是非标准常常摆移,人间间必生龌龊,自我亦难以把握,爱情远比肉欲脆弱,友情最难持久,树倒猢猻必散,炎势必引趋附,死的自死,活的自活,而且‘人们到处生活’,并且‘生生不息’……这些感想必然导致悲观、颓废么?然而,通过此书的‘文本’,你又会感受到俗世的魅力,凡人琐事的‘天然合理’,世道中超越黑暗的那些‘共享乐趣’,以及不必为‘形而上’约束的洒脱与狂放,当然还有‘我色,故我在’的坦然,超出个人际遇的那种自然美景与‘人创繁华’,死的未必可怖,生的不必那么沉重,等等,从而又生出一些乐观与旷达,自珍与自谅。”刘心武对《金瓶梅》的溢美性评价实在令人吃惊。从这些混乱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无可无不可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可以看到缺乏力量感的悲观主义情绪,甚至可以看到逃避现实的无为主义态度。这些观点既缺乏伦理上的庄严感,又没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与其说显示出对《金瓶梅》的深刻理解,毋宁说表征着人们在精神生活上失去方向的迷乱状态。

对《金瓶梅》更离谱的过度诠释和过分赞誉,来自海外的一些学者。他们常常将《红楼梦》与《金瓶梅》尖锐地对立起来,通过贬低《红楼梦》来抬高《金瓶梅》。例如,宇文所安就在一篇序文中说:“《金瓶梅》所给予我们的,是《红楼梦》所拒绝给予我们的宽容的人性。如果读者偏爱《红楼梦》,那么也许是出于对于纯洁的无情的追求,而这种对于纯洁干净的欲望最终是缺乏慈悲的。”他的判断是想当然的,令人费解的,与我们的阅读经验是迥然不同的。恰恰相反,《红楼梦》才是慈悲的,表现着“宽容的人性”的,而《金瓶梅》表现的——至少从效果上看是这样——却更多的是对于人性和生活的不宽容、不慈悲,是对人性和生活的缺乏美好诗意的描写。

然而,更离谱的还不是这位外国汉学家的近乎郢书燕说的误解,而是一位生活在外国的中国学者的“后现代主义”阐释。在这位受到西方观点影响的华人女性看来,《红楼梦》是幼稚的,是“贾府的肥皂剧”,而《金瓶梅》才是完全意义上的“成人小说”:“一个读者必须有健壮的脾胃,健全的精神,成熟的头脑,才能够真正欣赏和理解《金瓶梅》,能够直面其中因为极端写实而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刘心武:《读金瓶梅杂记》,载《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3期。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田氏的观点与她所欣赏的孙述宇对《金瓶梅》的不切事实的过度阐释,实有先后呼应之关系:“他笔下有几十人是细细写出来的,不但各有面目,而且各有生活。后来的《红楼梦》也写出不少各有声音笑貌的人,但没有几个能有个别的生活、追求与所关切的事。《金瓶梅》画面之广阔,要《战争与和平》与《Middlemarch》才比得上。”(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格外惊心动魄的暴力——无论是语言的,是身体的,还是感情的。《红楼梦》充满优裕的诗意,宝玉的‘现实’是真正现实人生里面人们梦想的境界:试问有几个读者真正享受过宝玉的大观园生活?……《金瓶梅》里面的生与旦,却往往充满惊心动魄的明与暗,他们需要的,不是一般读者所习惯给予的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强有力的理解与慈悲。”田晓菲女士说完这段话,便立即提醒读者“尽可以不理会我耸人听闻的广告词”。她的提醒并不多余。只是我们还有更多的疑问:“肥皂剧”的判断是不是下得太离谱了些?为了“直面”《金瓶梅》,你对读者的要求是不是太多、太实利主义了一些?谁说只有能被“享受”的“大观园生活”才是真实的?谁说“充满优裕的诗意”和具有“梦想的境界”的小说,其价值就一定低于只是充满“惊心动魄的明与暗”的小说?还有,更主要的,“一般读者所习惯给予的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就一定是多余的或者错误的吗?

由于气质和趣味上的差异,她不喜欢《红楼梦》的纯洁和感伤:“学黛玉葬花罢,也太肉麻了一些,说来惭愧,只有把它扔进垃圾桶了事。我因此不愿买它,不愿插它,不愿想它凋残之后的命运——唐诗不是说‘化作春泥更护花’么(原文如此——笔者),但这也是只限于文字的美,因为现实中的春泥,是令人难堪的。”尽管她承认《金瓶梅》是“三 X 级的”,但是,“《金瓶梅》里面的人物,男男女女,林林总总,我个个都爱——因为他们都是文字里面的人物,是写得花团锦簇的文字里面的人物,是生龙活虎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我知道倘在现实世界里面和他们遇见,打起交道来,我一定要吃亏的。”爱得很不寻常,也很不正常。美国的煤油大王不知道刘姥姥的辛酸,哈佛的教授好像也很难理解黛玉的忧伤。显然,田晓菲对《金瓶梅》的阐释,充满了太多的偏见和可怕的武断。在后现代语境下,这种偏重“娱乐”效果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与解构主义的阐释方法,在古典作品研究上究竟有多大的有效性,实在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

事实上,如此无节制地贬低《红楼梦》以抬高《金瓶梅》的“恶搞”,六七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了。阿丁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曾经发过这样的奇谈怪论:“我觉得《金瓶梅》之意识,实是反抗的,积极的,不若《红楼梦》意识之腐化与消沉。这正是《金瓶梅》处处是反面的描写,而《红楼梦》则是正面的描写。”这位阿丁先生甚至拿《金瓶梅》当做“慈悲心肠的宝典”。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批评和研究毕竟是诉诸理性的心智活动,它要求的是合乎事实的分析和判断,而不是徒作惊人之论的凿空乱道,信口雌黄。我们应该认识到,《金瓶梅》极力渲染色情场面的秽亵描写给中国后来的小说写作树立了极坏的榜样,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对它的拙劣模仿,而《金瓶梅》的恶劣的趣味倾向和“怨毒著书”的狭隘心态,更是给后世文学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 二、“伟大”乎?“慈悲”乎?

的确,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哪部小说像《金瓶梅》这样,既让人欣赏,又让人厌恶;既让人惊叹,又让人惋惜。它无疑是一部天才的小说,但却很难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沈德符就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他不愿为了蝇头小利(“刀锥”)而换得下地狱(“泥犁”)的惩罚,因此拒绝了朋友的怂恿和“梓人之求”。日本近代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第 3 页。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第 314 页。另,“化作春泥更护花”不是“唐诗”,而是清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诗句。

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第 176 页,第 177 页。

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第 222 页。

的启蒙主义文学批评家坪内逍遙也对《金瓶梅》评价甚低：“《金瓶梅》、《肉蒲团》以及猥亵的情史之类，都是似是而非的小说，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类小说都含有艺术中最忌讳的猥亵下劣要素的缘故。”夏志清也曾批评《金瓶梅》是一部“修养如此低劣，思想水平如此平庸的书”。

进入当代，从伦理精神上质疑《金瓶梅》的批评，虽然难得一见，但也不是没有。早在上世纪50年代，何其芳就曾批评《金瓶梅》过于“黑暗”，缺乏“理想”和“诗意”。与郑振铎不同，在何其芳看来，我们不能用“环境”替作家开脱责任。何其芳在把《红楼梦》和《金瓶梅》作比较的时候指出，虽然《金瓶梅》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也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却更喜欢《红楼梦》：“理由也许不止一个。但其中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一个规模巨大的作品里面，正如在我们的一段长长的生活经历里面一样，不能满足于只是见到黑暗和丑恶，庸俗和污秽，总是殷切期待着有一些优美的动人的东西出现……那些最能激动人心的作品常常是不仅描写了残酷的现实，而且同时也放射着诗的光辉……这也是文学艺术里面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不是虚伪地美化生活，而是有理想的作家，在心里燃烧着火一样的爱和憎的作家，必然会在生活中发现、感到、并且非把它表现出来不可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一个作品没有诗，几乎就是没有深刻的内容的同义语。”何其芳因此尖锐地否定《金瓶梅》：“《金瓶梅》所缺少的就是这种诗的光辉，理想的光辉。问题还并不在于它是那样津津有味地描写那些淫秽的事情，就是把那些描写全部删削，成为洁本，在它里面仍然很难找出优美动人的内容来……尽管它描写得那样出色，那样生动，仍然不能不使读者感到气闷。”同时，他高度评价《红楼梦》，认为它：“写出了黑暗的国度的对立物。残酷、污秽和虚伪并没有完全压倒诗意和理想。所以我们能够一读再读而不觉得厌倦。我们从它感到的并不是悲观和空虚，并不是对于生活的信心的丧失，而是希望、勇敢和青春的力量。”一个作家的境界的高下，创作成就的大小，固然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说，却决定于他是否能超越环境的限制，写出充满诗性光辉和理想精神的作品——就此而言，《金瓶梅》离伟大的距离，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伟大几乎可以被当做慈悲和善良的同义词，因此，对《金瓶梅》进行溢美性评价常见的策略，便是赋予它慈悲的性质。博大境界的慈悲具有超凡脱俗、泛爱众生的性质——它的根本特点就是不仅摆脱了肉欲等低级欲望，而且还有替他人担荷苦难的牺牲精神。而对一个小说家来讲，最大的慈悲，就是充满爱意地设身处地地写人物，写他的苦恼，写他的欢乐；写他的绝望，写他的祈向；写他的耻辱，写他的尊严。他必须把自己的人物——哪怕他是一个罪人——写得让人心疼，让人怜惜。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慈悲，并不像曹雪芹那样，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痴痴地流尽“一把辛酸泪”。不宁惟是，《金瓶梅》的作者正像第二十九回里吴神仙评价孙雪娥所说的那样：“冷笑无情”、“机深内重”。无情之人看世间一切，都是可憎、丑恶的。在《金瓶梅》里，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令人厌恶的，都缺乏基本的道德意识和起码的伦理自觉。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就指出《金瓶梅》里没有好人：“西门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土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我们禁不住要问：这还是一个由正常的真实的人构成的世界吗？作者对待人物和生活的态度是公正而富有人性的吗？

的确，在《金瓶梅》中的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试图教化世人的道德说教和伦理主

坪内逍遙：《小说神髓》，文洁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8页。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胡益民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页。

何其芳：《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7页，第129页，第130页。

《金瓶梅》，张竹坡评，第35页。

张,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小说家不能光看他如何说,而是要看他如何做;不能光看他的宣言和动机(我称之为“小说的外部伦理”),还要看,而且主要是看他是如何具体叙事和描写的(我称之为“小说的内部伦理”)。很多时候,内部伦理比外部伦理更能显示作家的伦理态度。外在地看,《金瓶梅》的“白描”显得很冷静,很客观,很公正,很真实,但是,往深里追究,你会发现,它对人物的态度是冷漠的,甚至是冷酷的——它只是外在地静态地写人物的动作和言语,而很少内在地动态地写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写他们内心活动的微妙的深刻的变化过程,正像俄国汉学家费舒曼所说的那样:“同法国风俗小说一样,在《金瓶梅》里实质上并未揭开人的内心世界,并未表现他们的感情。人物的性格表现在他们的言谈行为之中,而不是表现在他们的思想感情里;书中没有心理分析,人物都是用一个色彩描绘出来的,没有深入到他们的心灵世界。”《金瓶梅》的这些问题,典型地见之于对潘金莲的简单化描写。作者笔下的这个“淫妇”,虽然貌美,但是心胸狭窄,狠毒而淫荡。她残忍地鸩杀了亲夫武大,教唆西门庆害死了来旺,从而导致宋蕙莲自缢和蕙莲之父宋仁的死亡。她对自己身边的丫鬟秋菊毫无怜悯,折磨她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不仅如此,她对自己的母亲潘姥姥也缺乏起码的敬意和孝心。她心心念念想的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点事情,直到最后被吴月娘赶出西门庆家门,犹自一晌贪欢,没有觉悟:

这潘金莲,次日依旧打扮乔眉乔眼,在帘下看人,无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画眼,就是弹弄琵琶。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儿斗叶儿、下棋。那王婆自去扫面,喂养驴子,不去管他。朝来暮去,又把王潮儿刮刺上了。

在潘金莲与王潮儿厮混的时候,作者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描写了王婆母子的对话,随后,又来了“几句双关”,对人物进行嘲笑和挖苦:“你身躯儿小,胆儿大,嘴儿尖,忒泼皮。见了人藏藏躲躲,耳边厢叫叫唧唧,搅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伦,偏好钻穴隙。更有一桩儿不老实,到底改不得偷馋抹嘴。”在《金瓶梅》作者笔下,潘金莲完全是个没心没肺的空心人,人格不仅没有任何发展,而且麻木到连自己的处境也毫不关心的程度。张竹坡对这些描写却大加赞赏,如“仍复收到帘下,何等笔力”;“方是金莲”;“爽是十分满足”等评点。然而,从这些外在而冷漠的描写里,读者看见的却是作者的冷漠,是他对人物的一成不变的偏见和敌意,是对人物内心的真实感受的视而不见,而不是“何等笔力”,更不是“仁慈”。

在《金瓶梅》中最缺乏仁慈之心和伦理境界的,就是作者对武松杀嫂的描写:

(武松)提起刀来,便望那妇人脸上撒了两撇。妇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饶,放我起来,等我说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剥净了,跪在灵桌子前……这武松一面就灵前一手揪着妇人,一手浇奠了酒,把纸钱点着,说道:“哥哥,你阴魂不远,今日武松与你报仇雪恨。”那妇人见势头不好,才待大叫。被武松向炉内挝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来了。然后劈脑揪番在地。那妇人挣扎,把髻髻簪环都滚落了。武松恐怕他挣扎,先用油靴只顾踢他肋肢,后用两只手去摊开他胸脯,说时迟,那时快,把刀子去妇人白馥馥心窝内只一剌,刺了个血窟窿,那鲜血就冒出来。那妇人就星眸半闪,两只脚只顾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双手去斡开他胸脯,扑挖的一声,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血沥沥供养在灵前。后方一刀割下头来,血流满地。迎儿小女在旁看见,唬的只掩了脸。武松这汉子端的好狠也。可怜这妇人,正是三寸气

徐朔方编选校阅《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265页。台湾学者孙述宇却说:“他(《金瓶梅》作者)笔下的百十个大小人物,可说是没有一个肤浅单调,没有一个是福斯特(E. M. Forster)称之为‘扁形’的概念化人物,原因是他对人性存着一般强烈的好奇,那不是一般俗见满足得了的。”(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第182页。)这显然不是一个妥帖、可靠的判断。  
《金瓶梅》,张竹坡评,第1376页。

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亡年三十二岁。

阅读这段文字，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不快甚至厌恶的感觉。作者先是把一个陷入不幸境地的女子写成无耻的、人皆曰可杀的荡妇，然后再用如此富有娱乐性的虐杀仪式剥夺了她的生命。千百年来，我们就在这种对女性的野蛮惩罚和报复中，体验着一种虚假的正义感和空洞的满足感。而《金瓶梅》作者所渲染的虐杀，则尤为凶暴、可怖——它是如此缺乏人性和温情，就连那位认为理解《金瓶梅》需要“强有力的理解与慈悲”的不喜欢《红楼梦》的哈佛教授，也禁不住说：“这个过程惨烈之极，使用的都是隐藏着性意象的暴力语言。”是的，正是在这样的飞扬、淋漓的文字中，我们看见了跟武松一样“端的好狠也”的作者，看见了他叙写屠戮时的欣快和陶醉，看见了他渲染暴力场面时的冷漠和无情。“武松这汉子端的好狠也”这句话说得轻飘飘，与其说是谴责，无宁说是赞赏。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仇恨转移到了与潘金莲有关的其他人身上，张竹坡说：“……再至林太太，吾不知作者之心，有何千万愤懑，而于金莲发之。不但杀之割之，而并其出身之处、教习之人，皆欲置之死地而方畅也。”“作者盖深恶潘金莲，而并恶及其出身之处，故写林太太也。”张竹坡一厢情愿、不切实际地美化《金瓶梅》，言过其实地赞美它的作者有菩萨心肠：“总以菩萨心发菩萨愿，愿天下无终讳过之人，人无不改之过也。夫人既死，犹望其改过于来生，然则作者之待西门何其忠厚慨恻，而劝勉于天下后世之人，何其殷殷不已也。”可是，没过多久，他却又说：“作者直欲使此清河县之西门氏冷到彻底，并无一人。虽属寓言，然而其恨此等人，直使千百年之后，永不复望一复燃之灰。吁！文人亦狠矣哉！”如此颠三倒四般自我拆解，谁其听之？谁其信之？

不过，“文人亦狠矣哉”！倒是对《金瓶梅》作者的准确评价。

既然如此，我们还能闭着眼睛说《金瓶梅》是“伟大”和“仁慈”的吗？

### 三、消极伦理倾向与色情化叙事

小说伦理是指小说作者与对象世界的伦理关系、作者展开叙事所表现出的伦理态度以及作品所表现的伦理情调与伦理主题。

小说作者与对象世界的伦理关系体现在四个方面：一种是作者与人物的关系，一种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一种是作者与现实的关系，一种是作者与自我的关系。在这四种关系模式中，作者居于核心的位置，起着主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四种关系的状况和性质，都决定于作者的伦理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及实现这种伦理意识的艺术上的熟练程度。

从伦理态度看，作者既要对人物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他固然要忠实于自己的人物，要客观、真实地描写他们的生活，但是，同时他也要爱他们，尊重他们，要对他们显示自己真挚的情感态度。而作者叙故事、写人物，其最终的目的，是指向读者的——积极的小说伦理要求作者具有这样的自觉意识，那就是，通过有效的修辞手段表现诗意的伦理情调和有价值的伦理主题，从而有效地影响读者的阅读反应，使他们喜爱、接受小说中的人物，最终接受作者通过人物塑造和情节叙述所表现的升华性的道德情感和伦理态度。凡是能以诗意的方式来写人、来表现自己的伦理态度的，便可以称之为小说写作上的积极伦理，反之，凡是以粗俗、野蛮、色情的方式来写作的，便是小说写作上的消极伦理。

从艺术上看，《金瓶梅》无疑有着第一流的才华。近代狄平子在《小说新语》中说：“不知《金瓶》一书，不妙在用意，而妙在语句……至《金瓶》则纯乎语言之小说，文字积习，荡除净尽。

《金瓶梅》，张竹坡评，第1393页，第31页，第32页，第33页，第48页。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第260页。



读其文者,如见其人,如聆其语,不知此时为看小说,几疑身入其中矣。”张竹坡也说:“读《金瓶》,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来。”就其语言描写的充分的生活化和生动性来看,《金瓶梅》的确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但是,生动性和真实性并不等于充满净化力量的诗意性。从“暴露”的尖锐性和真实性,升华到道德的诗意性和伦理的严肃性,是一个充满考验的艰难过程。《金瓶梅》的描写虽然的确获得了令人“几疑身入其中矣”的真实效果,但是,它的生动性缺乏正常的伦理态度,显示出一种严重的消极伦理倾向。它对人物的态度是阴冷的、简单的,缺乏深刻、温暖的情感内容。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它对性的描写是粗俗的、泛滥的,对人物的动物性行为描写太多,对他们的无教养的行为渲染太过,正像杨义所指出的那样:“它感慨于整个社会在金钱和权势支配下的野兽化和市侩化,又不能免俗地渲染着兽化性欲和佻化奸巧。”日本学者小野忍也批评《金瓶梅》的作者“可能是个玩世不恭的文人,讽刺、痛骂现实中的阴暗面,往往倾向于恶作剧,缺少尖锐的批判”。这个批评很尖锐,但也很有道理。是的,《金瓶梅》是一部很奇特的书。它虽然有着外在形式上的庞大,但缺乏精神上的伟大;它的才华是令人惊叹的,但在情感上却是病态的。

凯瑟琳·麦金农在《色情作品、民权和言论》一文中细致地界定和说明了色情作品:“我们将色情作品定义为通过图片或者语言表现的、女性在性上生动而清晰的附属地位,这还包括女性作为对象、物件或者用品而被剥夺人性;女性对痛苦、羞辱或者强奸的喜爱;女性被捆绑、折磨、毁伤、打伤,或者在身体上被伤害;女性摆出性屈从、卑屈,或者性展示的姿态;被还原成身体的部分,被物体或者动物刺入,或者在堕落、伤害、折磨的场景中出现;被展示为淫欲和低等的;在一个使得这些情形与性相关的背景下流着血、被打伤或者伤害。与之不同的色情文艺可能是基于平等前提的、在性方面直露的。”在《金瓶梅》里麦金农所说的这些色情事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西门庆对潘金莲(第十二回)和李瓶儿(第十九回)的侮辱和施暴,就属于典型的色情描写。尤其在第二十七回,西门庆野蛮的性虐待,几乎要了潘金莲的命,但是,作者却将叙述的焦点集中在对性行为的过度渲染上,而没有表现出对人物的正常的同情态度。

梁实秋曾经强调文学应该以正常的态度表现常态的人性:“我所谓文学要表现常态的人性,并不是说文学里绝对的不可把变态的人物作题材。最变态的性格,我们可以用最常态的态度去处理。文学里很重要是作者的态度。”《金瓶梅》最缺乏的,显然就是这种“最常态的态度”。然而,我们在谈论、研究这部小说的时候,却总是忽略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人物的态度,忽略作者对于读者的伦理责任。如果说,用理性的精神和常态的眼光观察生活,用温暖的心情和积极的伦理态度对待人物,乃是一切伟大的小说最根本的特点,那么,《金瓶梅》缺乏的就是这些品质。指出《金瓶梅》的这些不足和问题,不仅事关对一部作品的评价是否全面,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时代文学风气的形成和文学趣味的培养——兹事体大,岂可以轻心掉之,岂可以轻心掉之!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元亮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页。

《金瓶梅》,张竹坡评,第43页。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第209页。

詹姆斯·斯特巴:《实践中的道德》,李曦、蔡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1页。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21页。